

通過紙張的治理：1950年代的上海改造*

孫曉忠**

<目 次>

1. 物質史到生活史：上海摩登文化的發生
2. 紙張治理與1954年的新聞紙事件

1. 物質史到生活史：上海摩登文化的發生

1990年代后，上海研究成为显学，有对中国现代性起源的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的发现，也有对1920年代左翼文学乃至195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另一种上海摩登”的再解读，“上海热”成为不同的知识界当下中国的一个装置，其中1950年代的上海因其现代性的交叉性逐渐引起关注。目前已有学者在诸如时代的断裂和文化的延续；以及在具体的报刊研究领域（如小报）对这时期一独特的文化转型做过有意义的研究。研究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文化改造是一个绕不开的领域，文化改造是否仅仅是工商业改造的附属部分？是否打压了上海的传统现代性？这一时期上海文化是否仅仅因其处于新旧之间的“过渡性”和边界性而呈现其丰富性？在这样的课题中，不仅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动性和独特性被忽略，而且“文化”对于铸造新国家的重要意义也被弱化了。这一时期上海文化具有的非稳定性和灵活性，呈现出既不同与解放前，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的稳定的文化结构。在上海改造所以成功，在于文化改造被当做重中之重，先于工商业改造，因为文化承担着对历史和生活意义的重新解释的重任，在创造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中扮演主角。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纸张管理讨论1950年代新民主主义

* 本文獲上海市第三期重點學科現代文學資助，編號S30101。

** 孫曉忠，200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現為上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258 中國文化研究 第19輯

义文化实践中对地方性的改造和文化上的独特的治理方式，在此基础上考察新民主主义处理资本主义的独特经验。

朝鲜战争爆发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在加工订货时出现的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等商业投机行为，以及农村中由新富农带来的新的贫富对立，使毛泽东改变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了新认识，并迅速修改了新民主主义中的对待资本主义的方案。“五反”的根本目的就是加快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私营文化出版业的态度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一届出版会议上，胡愈之提出了对待私营出版物“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政策，但地方管理部门具体执行时却只顾“一视同仁”，忽视“有所不同”，“对私营出版不是积极的分别整顿的方针，而是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而实际上在各方面（发行上、纸张配合上）鼓励他们的发展¹⁾”。自此对私营文化机关的改造加大了力度，也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方式。其中对纸张和发行的限制成为控制私人出版物的更为“自然化”的方式，围绕着纸张分配的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实践，同样呈现出中共在文化治理上的“软”和“硬”。

在《印刷书的诞生》中，费夫贺讲了印刷工业诞生和纸张普及的关系，并告诉我们书籍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兴起的关系。十七世纪末法国造纸业在欧洲的领先直接导致“百科全书”诞生和启蒙运动的爆发。为我们从物质史到文化史的研究开辟了新视角。²⁾虽然造纸术由中国发明，现代造纸业的革命却发生在19世纪的日本和欧洲。洋务运动后，现代造纸业为何选择上海，这和造纸行业对水源以及电动力的需求大有关系，和传统江南以制造宣纸为主的传统手工造纸相比，现代制造业更依赖电力和便捷的海路和铁路运输。北方虽然木材原料相对丰富，但中国因一直缺乏制浆技术，造纸的木浆也主要依赖进口。

在考察上海何以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现代印刷文化的中心时，孟悦试图在整个江南文化的变迁中，解释现代出版业迁移至上海的必然性。义和团战火和都市新读者群的产生，决定了刻书要地由江南城市向上海迁移。³⁾但是对上海造纸业如何影响

1) 《出版史料》第三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165頁。

2) 費夫賀·馬爾坦《印刷書的誕生》，李鴻志譯，貓頭鷹出版社，2005年。

3) 孟悅，《商務印書館館辦人與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會構成》，《學人》第九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

上海的出版文化格局，目前还没有人关注，比如1882年中国第一家现代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局诞生，以及随后诞生了纸张专卖的“纸号”。这对晚清上海的现代文化出版业的繁荣意味着什么？当1897年四个掌握了洋人的印刷技术的年青人商议着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时，上海纸张的便利有没有成为他们选择的原因？二者的联系也可进一步帮助我们思考民国时期现代造纸业和报业文化的相互生产。⁴⁾

上海的造纸业虽然起步于洋务运动，但因屡遭战火，厂房和机器经常被炸毁，一直不景气，“八一三”战火后，抗战爆发，造纸厂南迁，带来机器和厂房流失，脆弱的上海造纸业雪上加霜，造成纸价不稳，市场稀缺。政府提高了洋纸进口税率后，上海纸市一度畸形发达，也因此在大造纸厂机器和厂房纷纷被战火毁坏后，小规模的手工造纸作坊卷土重来。仅1939年一年就出现30多家以机器制浆、“用手抄纸”的纸厂，但“均因质量差，成本高，靠天吃饭，无利可图”，经过短时期的挣扎而纷纷倒闭。

就新闻纸来说，由于洋纸倾销，上海的民族造纸工业可谓惨淡经营，一直振兴不起来，直到1921年3月天章纸厂才造出首批“天字白报纸”，即新闻纸。旋因采购木材原料困难和电力不足，无利可图而停止生产。⁵⁾因此建国前上海的造纸厂主要生产低端品种，如包装纸、连史纸、毛边纸、草纸，能勉强和洋纸竞争的纸张品种少之又少，供出版印刷报纸用的白报纸更少。所以戈公振说，三十年代上海虽然率先产生了几所“洋纸”工厂，但直到三十年代仍然“规模太小，出货无多，营业不振，时起时蹶”，以老牌的天章纸厂为例（前身李鸿章一手扶持），因效益不好，1933年天章纸厂就老板裁员或工人因老板克扣工资罢工事件。⁶⁾1949年上海解放前，多家造纸厂停产或亏损，上海造纸产量不足正常产量40%，32家私营造纸厂有28家先后停工。⁷⁾

此时解放区的造纸业更薄弱，因纸张稀缺，造纸工厂在边区成为半军事的保密单位，直到40年代，边区造纸完全是手工业方式制纸，“每两分钟抄纸一张”，每日抄纸大簾纸六、七百张，即便后来增了产，也远跟不上用。因原料紧缺，改用更为经济的

4) 《上海造纸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9頁。

5)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1955年，241頁。

6) 1933年11月23日《紅色中華》報道了上海天章造紙“老板克扣工資以及老板裁員造成工人罷工事件”。

7) 《上海造纸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16頁

野生的马兰草代替高粱秆、麦秸、麻和废纸。这样的土纸附着渣滓多，成为延安土纸的一大特点。⁸⁾

2. 紙張治理与1954年的“新聞紙事件”

1950年新闻出版署决定上海区计划生产纸张，纸张比其他资本主义公私合营企业更早地从加工订货，发展到初步包下来，将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⁹⁾产量占全国纸张产量的43%。其中新闻纸2.2万吨，占全国产量的35%。¹⁰⁾新闻纸张生产在建国初期仍供不应求，1954年轻工业部年生产新闻纸张的能力只有8万吨，而这一年，仅纯公营的新闻出版系统就需要新闻纸9.8万多吨¹¹⁾，大量的缺口仍然依赖进口。

上海解放初期出版物骤降，纸张匮乏以及私营出版社经济不景气是主要原因，部分私营文艺期刊的经营状况处于涣散和亏损状态，所以撤消或合并也是很自然的事。1951年3月天章因积欠可恶款甚巨，无力清偿，总经理刘季涵与债权人，人民印刷厂、解放日报社等6个单位取得协议，改组为公私合营，解放日报社等重新投资，私营股份仅占了2.78%。为缓和纸张供不应求，打击纸张投机外流（出口）等投机行为。1951年新闻纸全部由中百订货，新闻纸以外的薄纸，中百定货70%，其余30%可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后者虽说是自销，也是在国家控制下分配，“由纸交易所指定分配给专业彩印业、铅印业、文教用品业、纸盒业、卷烟业等6个单位”。对于在政治上没有原则问题的私营出版物虽然任其出版，但是对于印刷业纸张却是有所控制，根据徐铸成的回忆，文汇报1950年尚可从香港进口白报纸，但国家统一进出口贸易后，私营出版业的纸张进口渠道被堵死。¹²⁾

控制纸张，首先是要克服解放前盲目印刷出版的混乱的出版市场。由于国营印刷能力还很低，上海出版业主要还是依靠私营印刷加工订货，50年代初期，国营现代印

8) 《土紙產量增加》1940年8月30日《新中華報》，〈毛邊紙當蜡紙用〉1933年8月4日《紅色中華》。

9) 《上海造纸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45-46頁。

10) 《上海造纸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17頁。

11) 〈出版總署關於新聞紙產、供銷情況和改進意見的報告〉，《出版史料》第六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177頁。

12)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1998年4月，215頁。

刷厂的工价比私营手工业大；对出版社的待遇如纸张加放率比私营厂苛刻；管理人员比私营多，管理成本比私营高，这些都推高了印刷成本。当时的人感叹“社会主义性的企业竞赛不过夫妻老婆厂，正是怪事”。¹³⁾于是1952年，中财委提出对于私营出版社用纸不再按照配售价格分配新闻纸，而由贸易系统按照市场价格供应。出版总署由于担心配纸方针改变过快，影响太大，增加工作上的困难。请求文教委仍然以配售价供给私营出版社纸张，并同意对于私营出版社指定申请配纸方法，“自应比过去更求更严格控制”，私营出版社如果想申请到纸张，应向当地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呈报用纸计划，并要求具备三个条件：1.遵照已经发布的管理出版业暂行条例向当地行政主管机关申请登记，并经核准营业者；2.事先将出版计划送经当地行政主管机关审查批准；3.不得有虚报浮领纸张情事。对于私营出版物的价格同样规定，先进行“一般控制，俟条件成熟，再逐渐走向严格控制”¹⁴⁾。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文化单位用纸的计划性愈趋量化，耗纸率、囤纸量都有严格规定，私营厂家想得到额外纸张须去市场高价购买。这一年出版总署出台了《新闻纸统一分配调拨办法》和《新闻出版单位用纸标准的规定》两个文件，用以具体审核和监督文化用纸的使用情况。文件中说今后管理纸张工作加重，规定经政府核准登记的报社，不论公私营，均可提出用纸计划，申请分配纸张。除报纸外，国营的出版社和期刊杂志社也同样可以申请，但是私营的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纸张则需自行从市场购买，以上所有各单位如承印外件部分所需用纸张，不得代为申请分配新闻纸。至于公私合营的出版社、杂志社，在其出版计划、发行数量和书刊价格，由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严格审核和控制的条件下，也得配给纸张。但是私营出版社和杂志社需用纸张，应另行采购，不列入分配范围之内，只有承担政府指定的出版任务，有印刷合同的，才配给一定品种和数量的纸张¹⁵⁾。对于私营报社、出版社、杂志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为什么报社用纸给予配售，而对于私营杂志社和出版社只有拿到了公家

13) 《出版史料》第五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152頁。

14) 《出版總署關於對私營出版社配紙意見請文教委員會核示函》，文教委員會於1952年8月30日以廳機密字第40號函復：“同意你署對私營出版社配紙問題所提各項意見”。《出版史料》第四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182—183頁。

15) 《出版總署關於“新聞紙統一分配調撥方法”及“新聞出版單位用紙標準的規定（試行草案）”的指示》，《出版史料》第五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30—39頁。

的定货合同才会有便宜的纸张¹⁶⁾？按照列宁的说法，报纸的教育宣传力量比期刊要大¹⁷⁾，书则更次之。重视报纸发行，也因为它是百姓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每天及时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对于已经养成了“读报”习惯的上海市民来说，是政治稳定的风向标，比如斯大林逝世，就引发了购买和阅读报纸的风潮。

公营出版单位获得配售价格的新闻纸后，其纸张使用去向管理得也很严格，库存和消耗的数量得定期汇报，“由国家分配纸张的报社、出版社、杂志社非经机关核准，不得在市场购买新闻纸，亦不得将存纸出售”，私营杂志社的确可以从百货公司直接购买少量的新闻纸，但价格贵，成本大，利润小，这至少也是私营报刊和书籍出版逐步消失的原因之一。而且即便这样的高价纸张，在市场上的数量也很小，对于私营杂志只是杯水车薪，私营报社做纸张投机以大捞一把则不大可能了。

但是1954年，全国在用纸方面出现的一个怪现象：一方面国产新闻纸供不应求，缺口很大，另一方面，如果把进口新闻纸数量算在内，新闻纸是供过于求。以至于上海的纸厂，将优质的纸张用于出口赚钱。另一个怪现象是，私营出版的报刊用好纸，国营的报刊用的是次品纸张。¹⁸⁾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直接的原因是产、供、销三方面缺乏统一管理而造成的部门利益保护。1952、1953年虽然新闻出版系统急需用纸，有时甚至因缺少纸张停工待料，但是商业部和各造纸厂却积压近3万吨的新闻纸，和进口纸比较，当时的国产纸质量还比较差。国营出版业优先使用国产纸，以振兴国营纸业，也是为了替国家节约。这是国营的报刊用纸较差的最直接原因，但是其背后仍有部门的、和地方的利益驱动，商务部将进口的好纸供应给私营出版商，恐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出版总署没有与轻工业部订货，因为私营出版商给商务部的单价要远远高于国家的计划价格。这样也不难理解为何上海的纸厂出口好的新闻纸，由于纸价不稳，个别报社甚至仍然存在囤纸赢利的投机行为，后者一直是三十年代各大报社的生意经。因此1954年总署署长胡愈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批评轻工业部供销总局将不合国营新闻、出版事业需要的规格的纸分配给新闻出版单位，将合于新闻、出版事

16) 《關於出版總署1954年報社、出版社、雜誌新聞出版用紙分配和儲備辦法》，《出版史料》第六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32—35頁。

17) 列宁說：“雜誌是鼓動，報紙是宣傳”，這句話指出了由於流通週期不同兩種刊印制品的分工特點。

18) 《出版總署關於新聞紙產、供、銷情況和改進意見的報告》，《出版史料》第六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175—180頁。

业需要的规格的纸分配给“其他单位”，将次品纸分配给国营单位，将好纸分配给“其他单位”，例如：

第二季度轻工业部供销总局曾配售我区为数不少的一批新闻纸次品，要求我处为国家纸张生产问题予以分配使用，但轻工业部供销总局却结余了一批合乎我们要求的规格的纸张向书报印刷厂直接配售（给书报印刷厂承印外作用），这不仅是不合理，亦将造成我区于分配次品时的困难，因而造成分配计划难以执行。印刷厂得到供销总局分配的纸张后，多半印制不甚重要的广告，并有一部分代私商印刷商品宣传品。¹⁹⁾

这就是1954年的“新闻纸事件”，轻工业部违反纸张的计划性规定，没有经过出版总署，随意将生产的新闻纸分配给下面书报印刷厂，结果让私商钻了空子，这种打乱配纸体系的行为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印刷厂获取这些比市场价便宜得多的“好纸”，就有可能替私商承印“精美”印刷品，也就等于私商获取了国家配售的新闻纸，这样对于私营出版投机商的控制失去了一条防线²⁰⁾。而按照苏联的经验，不直接向印刷厂配纸，以免印刷厂单纯从经济利益出发，而忽视出版事业上的政治与文化的需要。到了这个阶段，私营出版业希望和国家资本联姻也在情理之中了，公家入股后，不但投入大量本金，各种优惠政策都可以享受。

而如果任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扩大，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就相对缩小。乃至1953年工商业出现了公退私进的反常局面。²¹⁾

和用纸相关的，也有发行，用纸来控制印刷品发行，为抑制纸张投机，因纸张为稀缺品，建国初期即取消了专营纸张的私营纸号，也改造了以纸张交易的“茶会”（即当时上海流行茶楼进行交易的市场）。总路线后完全排出了纸的资本主义批发商业。建国初期，由于对市场尤其是农村阅读市场的盲目乐观，以及国营出版单位对于利润的轻视，许多单位盲目扩大报纸和通俗读物的印数，以印数为自己增加荣誉，造成大

19) 《出版史料》第六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177頁。

20) 《出版總署關於新聞紙產、供、銷情況和改進意見的報告》（1954年3月下旬） 席仲勛於4月1日批示：“擬同意出版總署所提紙張供需意見，請曾山副主任或指定專人召集有關同志商擬具體解決辦法，”并在出版總署所提四條意見后批：“以上四條即應考慮”。《出版史料》第6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177頁。

21)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49頁。

量报刊和通俗读物积压和浪费。有的甚至亏本办报。1953年报刊调整后，地方报刊的发行受到限制，这和纸张的匮乏也有关系。1953年报刊分级制度施行后，报刊地方利益重新抬头，各地要求放宽尺度，增加报纸杂志发行分数。这个要求被出版总署驳回，“希望各报纸，杂志社勿作过高希望”。如解放日报1953年2月发行超过核定数字，擅自增加发行2651份，受到华东新闻出版署的批评。1956年全国新闻纸缺口最大，由于报纸不断增加订数和扩版，1956年的新闻纸用量增加了39.5%，全年新闻纸需要约22万吨，但是轻工业部能提供的只有19.5万吨，3万吨的缺口需要进口。由于国际市场这一年纸张也紧俏，进口很难。这一年7月1日连人民日报扩成八版而增加的7000吨新闻纸很难得到供应。新闻出版署不仅驳回了各地报社盲目增加发行定额的请求，反而要求各报社将用纸计划压缩10%。要求各地方在调整印刷计划时，区别“轻重缓急”。纸张的紧缺，甚至也引起的订阅方式的变化，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尤其是1956年工资改革后工资普遍增加，私人订阅报刊有了可能性，人民日报为节约报纸发表社论，鼓励自己订阅报纸，从1956年10月1日起，开始私人订阅报刊。²²⁾这不仅不是报刊发行的重大变革，也是千百万人生活习惯的重大变革。

作为建国初期的报刊和作为上海报刊的领导者，解放日报在给各报社解释不准擅自扩大发行的原因时，其中最现实的原就是因纸张紧缺。²³⁾纸张匮乏之由于匮乏而引起纸张不断涨价，造成许多上海的报社50年代初都处于亏损状态，陷入发行越多，亏损越多的怪圈。根据解放日报的档案，某一年3月份材料费的增长就达20多次，其中主要就是纸张的价格波动。比如就成本来说，三月份每份是697元，4月份就变成了747元。而报纸此时已实行了提前订阅制度，定价1000元，扣除29%的邮发手续费。只有710元，预定制度开始后，报纸价格不允许上涨过快，和发行定额一样，一般也只允许每年的9月上报新闻总署。²⁴⁾报价上涨的速度跟不上报纸涨价的速度。而一般只允许各单位有三个月的纸张库存用量，亏损就不可避免了。

关于纸张问题，1952年上海报业发生了一起影响颇大的官司，事由文汇报拖欠解

22) 社論，《從各方面節約紙張》，人民日報1956年7月4日。社論，《自己出錢訂閱報刊》，人民日報1956年8月15日。

23) 上海檔案館，檔案號A73-1-161。

24) 解放日報社：〈關於本報今年度經營情況〉，上海檔案館檔案，檔案編號A73-1-77。

放日报的新闻纸不还而引起。私营报纸在1952年前仍然延续着解放初期的不景气状态，很多私营报刊为转嫁危机总是要求合营或完全公营，以求得到国家的投资。作为一家民营大报，文汇报在继续复刊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文汇报在经济困难、急需纸张时，军管会就指示“给予纸张和印刷方面的资助”，后上海市委机关贷借给大量纸张，为解决复刊初期的“报社亏损”，上海市政府又批评其向国外订购1000吨白报纸来周转资金，以出售进口纸购买国产纸赚取差价的形式，维持报社的日常开支。²⁵⁾ 创始文汇报人陈宝礼自有一套生意经：一是试图利用和上海新闻出版处处长陈虞孙私人交情，不还公家这笔纸，二即使赖不掉，在物价不稳的情况下，纸张是报社的硬通货，往后拖欠对文汇也有利，纸值会随着物价上涨而盈利。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报社和纸号都有这种盈利的方式。陈宝礼就一直强调，当年自己能从区区7000元起家，将文汇报的股价或百倍滚大，主要“主要是靠在纸张中翻筋斗翻出来的”。公私合营后，不少私营报社就是一方面申领纸张，一方面用多余的新闻纸私套外汇。公私合营前对文汇报财产估定，这对陈宝礼不能不是一个打击，因为纸账透明后，他对文汇报的一个重要的盈利方式可能从此断绝。因此他表示“从此没办法了”，对陈宝礼恶意拖欠新闻纸不还的行为，陈宝礼的朋友，上海报刊新闻处处长陈虞孙很不满，给他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

政府对文汇报的照顾不为不多，不为不久。试算一算，两年来，政府贷文汇报的现款以及解放日报贷给的纸张及现款，折合人民币总额，是不是超过了对其他任何报纸的照顾呢？大公报总共是报纸两百吨，新民报总共得到十五亿，还只是最近几个月的事。全国范围内还有哪一家报社所得到的照顾超过文汇报呢？然而你现在还在幻想政府借钱。你亦经常以报纸困难来要求照顾，似乎如果文汇报因没有照顾而关门，应由政府负责。这在前年讲也许还有理，因此前年政府给予大力援助的。可是现在不同了。经过这一年来，尤其经过纸账的初步结算情况，已经使政府的照顾得到了限度。²⁶⁾

1957年，5月18日，在鼓励鸣放新闻座谈会上，邓季惺批评新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党报是亲生子，非党报是螟蛉义子具体表现在采访工作中待遇不平等等等，我认为不仅如此，在纸张供应，增加设备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文化部分配给人民日报的

25) 《文匯報史略 (1949.6 - 1966.5)》，文匯出版社 1997年，7頁。

26) 《陳虞孫致嚴寶禮》，上海檔案館檔案，檔案號A73-1-113。

纸张不但量多而且质好，其他报纸就压缩数量，降低质量”²⁷⁾。但从文汇报的新闻纸事来看，不论是私营报社还是私营造纸厂，都不在给新社会的管理者出难题，就造纸来说，加工定货后，1954年，私营造纸业次货率第一季度为18%，第二季度为33%，第三季度为36%，1954年8月次货率高达44%，国营公司收进的次货纸张积压达四千吨左右，造成原材料的浪费和资金积压。²⁸⁾而此后全部改为公营后，江南造纸厂各种纸张的次品损失比合营前减少60.3%。²⁹⁾也许从对资本主义造纸业的加工订货中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毛主席从三反五反后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的必要性。到1954年，资本家多没有认真履行订货合同，不能按质按量完成加工订货任务，国家资本主义出现的危机则说明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大，对资本主义的节制也逐渐显露危机。偷工减料的问题已不能归因为个别资本家的道德品质，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决定。

《參考文獻》

孟悅，〈商務印書館創辦人與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會構成〉，《學人》第九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

〈出版總署關於新聞紙產、供、銷情況和改進意見的報告〉，《出版史料》第六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

〈關於出版總署1954年報社、出版社、雜誌社新聞出版用紙分配和儲備辦法〉，《出版史料》第六卷，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

社論，〈自己出錢訂閱報刊〉，《人民日報》，1956年8月15日。

解放日報社，〈關於本報今年度經營情況〉，上海檔案館檔案，檔案編號A73-1-77。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1998年。

費夫賀·馬爾坦，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貓頭鷹出版社，2005年。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三聯書店，1955年版。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

27) 參見1957年5月19日《光明日報》上的發言。

28)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65頁。

29)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89頁。

1980年。

文匯報報史研究室編寫，《文匯報史略（1949.6 - 1966.5）》，文匯出版社，1997。

《국문제요》

본 논문은 종이 물질사(物質史) 연구를 통해 1950년대 신민주주의 문화 실천 속에서 있었던 지역, 특히 상하이(上海)에 대한 개조와 문화에 대한 독특한 관리통제방식을 토론하면서, 신민주주의가 자본주의를 처리하는 특수한 경험을 고찰하고자 하였다. 50년대 상하이 문화는 신구(新舊) 사이의 과도기성과 경계성을 가지고 그 풍부성을 드러내고 있었지만, 신민주주의 문화의 적극성과 개성은 등한시되었으며, 사회주의 중국 건설에서의 '문화'의 중요성을 약화시켰다. 이 시기 상하이 문화는 불안전성과 유동성을 가지고 해방 전과 달랐으며, 사회주의 개조가 끝나고 난 후의 안정적 문화구조와도 다른 양상을 띠었다.

1950년대 신문출판부서는 상하이에서의 종이생산에 대한 계획적 관리통제를 진행하였다. 종이의 통제로 해방 전 혼란스런 민간인쇄출판 시장을 정돈하였고, 국영출판인쇄소를 강화하였다. 1953년 제1차 5개년 계획이 실행되었고, 출판총서(出版總署)는 <신문종이 통일적인 분배조달 방법新聞紙統一分配調撥辦法>, <신문출판단위 용지 기준 규정新聞出版單位用紙標準的規定> 문건을 하달하여, 문화 용지 사용에 대한 구체적인 심사와 감독하였다. 논문은 1954년 "신문지사건", 즉 용지 생산과 분배에서의 관리 문제로, "민간 출판 투기상의 통제에 방어진이 무너진" 사건을 상세히 서술하였고, 건국초기 종이생산과 분배를 통한 출판인쇄사업의 관리 통제방식과 당시 상하이 신문잡지 출판계 문화현상을 논술하였다.

주제어 : 상하이 출판문화현상 종이 분배관리 문화통제

이 논문은 2011년 11월 20일에 접수되어 2011년 12월 15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1년 12월 20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